

湘西烟雨中的悲剧诗学与文化隐喻 ——《边城》的文学伦理学阐释

谢滨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1)

摘要: 沈从文的《边城》以湘西茶峒为叙事场域, 通过翠翠、天保、傩送的命运纠葛, 构建了兼具诗意美学与悲剧内核的乡土叙事。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从悲剧叙事的三重维度、人性伦理的现代性困境、城乡文明冲突的文化隐喻展开分析, 揭示传统伦理秩序与现代性进程的内在张力。研究表明, 《边城》的悲剧本质是农业文明价值体系的解构过程, 其自然意象的哲学化运用与伦理选择的诗性表达, 为现代文学悲剧书写提供了独特审美范式。

关键词: 《边城》; 悲剧诗学; 伦理批评; 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作为文化符号的湘西悲剧

1934年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提出, 欲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 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在理想人性图景中铺陈悲剧叙事的创作理念, 构成理解文本的核心密码。学界对其悲剧性的阐释已形成多重路径: 凌宇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将其界定为“湘西世界的诗意挽歌”, 认为悲剧根源在于传统乡村文明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必然溃败; 汪曾祺则从民俗学视角指出, “茶峒人的善良天性与命运的无常构成了悲剧的张力”, 强调偶然性在悲剧形成中的作用。

近年来, 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引入, 研究者开始关注悲剧背后的伦理机制。如陈平原在《沈从文的文化立场》中提出, 《边城》的悲剧本质是“农业文明伦理体系的自我解构”, 而李欧梵则通过比较文学视角, 将其与哈代的乡土悲剧并置, 认为两者都体现了“自然伦理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现有研究对自然意象的哲学隐喻、伦理选择的文化基因及阐释学意义的探讨仍显不足, 尤其缺乏对悲剧叙事中“伦理过失”与“文化记忆”互动关系的系统分析。从文本实际出发, 《边城》的悲剧书写蕴含三重递进式维度: 首先, 自然环境并非单纯背景, 而是作为悲剧叙事的本体论存在, 通过山水意象的哲学化建构形成命运隐喻; 其次, 传统“义利之辨”在爱情抉择中演化为伦理裂变, 展现农业文明价值体系的内在张力; 最终, 翠翠的“等待”叙事升华为农业文明现代性转型的象征寓言, 折射出文化记忆的存续困境。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理解作品悲剧诗学的关键路径, 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一、山水本体论: 悲剧叙事的哲学建构

(一) 自然环境的悲剧性隐喻体系

茶峒的山水在沈从文笔下并非静态背景, 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悲剧叙事主体。这种哲学化建构首先体现在色彩叙事中: “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第一章)以温暖色调反衬命运的无常, 类似手法在《诗经·桃夭》中“桃之夭夭”的婚嫁隐喻里早有渊源, 但沈从文将其转化为悲剧预叙, 使自然色彩成为命运的视觉符号。嗅觉描写“空气中有泥土气味, 有草木气味”(第二章)则建构起双重叙事: 泥土的厚重象征乡土伦理的稳固, 草木的清新暗示生命的脆弱, 二者的嗅觉交织预演了人物在传统与现代间的伦理挣扎。

河水意象的哲学化运用更具深意。茶峒溪水“潺潺地流着”的永恒状态, 与天保溺亡、

祖父病逝的生命短暂形成尖锐对比，这种“自然永恒 — 生命短暂”的二元对立，暗合庄子“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时间哲学，但沈从文赋予其悲剧性变奏——当傩送的歌声在碧溪边戛然而止时，流水的持续性反而强化了生命断裂的痛感。这种书写与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威塞克斯荒原的地理悲剧异曲同工，却更强调自然的“诗意救赎”功能：即便在悲剧深处，茶峒的山水仍保持着审美的完整性，如小说结尾“溪水依然流淌，白塔重新矗立”的意象组合，在毁灭中暗示着重生的可能。

（二）建筑意象的文化伦理象征

白塔的坍塌与重建构成文本最富哲学意味的隐喻系统。作为茶峒的地标性建筑，白塔的物理属性被沈从文转化为文化符号：其“坍塌”发生在祖父病逝的雷雨中，“那一个夏天的雷雨，把它（白塔）推倒了”（第二十一章），这场自然灾害被赋予双重寓意——既是传统伦理体系外在载体的毁灭，也是翠翠精神依托的崩塌。但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动捐钱重新建造”白塔的行为，又将文化破坏转化为伦理修复的过程，这种“毁灭 — 重建”的循环，暗喻着传统伦理基因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顽强存续。

对比《红楼梦》中大观园的衰落叙事可见，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未将传统文明的消逝写就彻底的溃败，而是通过“救鸭子”等民间生活细节（“溪岸的人家都忙着救鸭子，家业方面受了点损失”），展现伦理基因如何从制度化载体（白塔）转化为生活实践（民俗）。这种书写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型的理论形成互文——当正式的伦理制度崩塌后，民间习俗成为伦理记忆的隐性载体。

（三）人物伦理困境的悲剧逻辑生成

天保与傩送的“山歌决斗”机制，本质是湘西传统伦理的诗性表达。这种源于苗族“情歌求婚”民俗的竞争方式，将爱情选择转化为伦理实践：既遵循“兄友弟恭”的儒家伦理（天保主动退出时称“让弟弟先唱”），又恪守“公平竞争”的江湖道义（傩送坚持“各人轮流唱三个晚上”）。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过失说”在此显现——兄弟俩将伦理原则绝对化的认知偏差，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天保将歌声失利等同于伦理失败，选择“下辰州”出走并最终溺亡；傩送则因兄长之死陷入“情义两难”，在“负气离家”中完成伦理自我放逐。

老船夫的伦理困境更具典型性。他在天保提亲时的“模棱两可”，折射出传统伦理的内在张力：天保代表的“车路”（明媒正娶）象征着制度化婚姻伦理，符合“父母之命”的儒家规范；傩送的“马路”（山歌传情）则指向自然人性表达，暗合《诗经》“关关雎鸠”的爱情传统。三次关键对话强化了这种伦理错位：初次端午相遇时，翠翠将傩送误认作“水手”，暗示伦理认知的初始偏差；天保提亲时“直白”与老船夫“委婉”的沟通方式差异，形成伦理信息的传递损耗；雨夜傩送与老船夫的对话中断（“我要回去了”），则成为伦理关系断裂的象征性时刻。这种因文化语境差异导致的沟通失效，在鲁迅《祝福》中“我”与祥林嫂的对话中也有体现，但沈从文更强调其悲剧性源于伦理体系本身的阐释弹性不足。

（四）情节肌理中的命运诗学建构

《边城》的情节推进呈现出“自然主义悲剧”的典型特征：看似偶然的事件链背后，隐含着必然的命运逻辑。从叙事时间维度看，存在三重悲剧性建构：

小说以“端午 — 中秋 — 端午”的自然时序为框架，节日的重复性与生命的一次性形成对比。如第一次端午翠翠遇傩送，第二次端午天保提亲，第三次端午翠翠独守渡口，相同节令中人物命运的剧变，强化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悲剧感。翠翠的“等待”体验打破了客观时间的线性属性。“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内心独白（第二十一章），将物理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的永恒当下，这种时间叙事与普鲁斯特《追忆

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琳蛋糕”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更具东方美学的含蓄特质。白塔的坍塌与重建构成历史时间的隐喻，其“重建”并非简单复旧，而是“比以前更高了一点”（第二十一章），这种细节暗示传统伦理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冯友兰“旧邦新命”的文化观形成跨时空呼应。

沈从文运用“延迟叙事”策略，将悲剧的爆发点无限后移。傩送的歌声在碧溪边的“戛然而止”，构成叙事学意义上的“空白点”，这种“未完成性”强化了悲剧的永恒性——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预言的不可避免性，傩送歌声的中断不是悲剧的结束，而是等待悲剧的开始。“虎耳草”意象的时序性变化亦具深意：从初次采摘时“摘了一把虎耳草”（第六章）的爱情萌芽，到风中摇摆时“虎耳草在微风里摆动”（第十五章）的情感动摇，最终到“虎耳草依旧在月光下摇着”（第二十一章）的等待无望，暗合《楚辞》中“采芳洲兮杜若”的香草象征传统，使植物意象成为命运轨迹的隐性注脚。

二、伦理现代性：悲剧背后的文化价值裂变

（一）人性光辉的伦理维度解构

《边城》的悲剧叙事中始终闪耀着人性的伦理光芒，这种光芒通过祖父形象得到集中体现。作为茶峒伦理秩序的具象化代表，祖父的行为呈现三重伦理完整性：

终身守护渡口的职业操守，拒绝船总顺顺的金钱馈赠，认为“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第五章），这种对“义利之辨”的恪守，与《论语》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伦理观一脉相承。为翠翠婚事奔波的祖父职责，在天保与傩送间的谨慎周旋，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伦理扩展。其雨夜离世时“看见对岸下小小白点子，知道是翠翠等他”的细节（第十六章），将生存伦理与亲情伦理熔铸为乡土中国的伦理典范。对邻里互助传统的遵循，如“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第三章）的自我告诫，展现农业文明中“守望相助”的伦理共同体意识。

天保与傩送的“磊落竞争”同样彰显农业文明“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不同于现代社会将爱情简化为占有欲的功利化竞争，兄弟俩遵循“义先于利”的伦理原则：天保在得知傩送也爱翠翠后，主动提出“让弟弟先唱”，体现“兄友”的伦理自觉；傩送则坚持“公平竞争”，拒绝因兄长退出而获得“侥幸”胜利，展现“弟恭”的道德自律。这种选择虽导致悲剧，却与鲁迅《伤逝》中涓生为追求个人发展而牺牲子君的功利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构成对现代性伦理的隐性批判。沈从文通过这种书写印证了其创作理念：“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题记），即使在悲剧中，这种人性形式依然具有伦理价值。

（二）“等待”叙事的现代性隐喻建构

翠翠的“等待”构成文本最富哲学深度的伦理命题，其内涵在现代性语境中不断衍生出新的阐释可能。从现象学视角看，这种等待包含三重伦理困境：

“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表述，打破了传统悲剧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间逻辑，将等待转化为一种没有终点的伦理实践。这种时间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向死而生”的生存论有相通之处——翠翠的等待本质上是对“死亡”（傩送不再回来）的直面与超越。对傩送的爱情与对祖父的亲情构成伦理张力。祖父病逝后，翠翠“把屋前屋后的草都拔得干干净净”（第十七章）的行为，既是对祖父的纪念，也是通过劳动转移情感痛苦的伦理选择，体现“哀而不伤”的儒家情感伦理。在守望渡口的过程中，翠翠通过“为他人摆渡”的行为确认自我存在价值。“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缘引了竹缆，把船横渡过小溪”（第二十一章）的重复动作，使等待从消极的时间消耗转化为积

极的伦理实践，这种转化与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推石上山的存在主义寓言具有精神同构性。

等待的对象在深层意义上不仅是傩送，更是正在消逝的湘西伦理秩序。当船总顺顺感叹“年轻人都出去了”（第十九章）时，暗示着传统伦理共同体的解体。翠翠的守望因此具有文化守夜人的象征意义，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归隐叙事形成跨时空伦理呼应——二者都通过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坚守，实现对主流价值的伦理抵抗。在现代性语境中，这种等待昭示着一种可能性：当工具理性日益主宰生活时，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本身就构成一种伦理姿态。当代社会中传统手工艺人的坚守、乡村教师的留守等现象，本质上都是翠翠“等待”精神的现代延续。

（三）城乡文明冲突的伦理根源探究

沈从文在《边城》中隐晦地设置了城乡伦理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构成悲剧发生的深层文化土壤。茶峒世界遵循的“人情伦理”具有三个典型特征：

老船夫拒绝船总钱物时说“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第五章），体现农业文明中“知足常乐”的经济伦理，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理性经济人”的现代伦理形成对比。祖父病逝后，邻里主动“捐钱出力”帮助翠翠办丧事（第十七章），展现费孝通所言“差序格局”中的伦理互助，这种伦理在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逐渐式微。傩送的“马路”求婚方式，暗合《诗经》“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自然婚姻观，与城市中基于物质条件的“车路”婚姻形成价值对立。而小说中隐约提及的“城市”，则代表着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伦理：天保“下辰州”闯滩的选择，暗示城市商业伦理对乡村青年的诱惑；傩送“下辰州”的决定，象征传统伦理主体的主动出走；祖父对“新嫁娘”的联想（“想起了翠翠的将来，且似乎也想到了自己的死亡”（第十四章）），则隐含对城市婚姻伦理的想象性认知。悲剧的深层根源在于，当湘西“人情伦理”遭遇城市“契约伦理”时，传统伦理体系因缺乏弹性而崩溃。天保的选择极具代表性：他既无法完全接受城市商业伦理（因此选择山歌竞争的传统方式），又不能彻底固守乡村伦理（因此选择出走），最终陷入伦理真空状态，其溺亡可视为这种伦理困境的象征性结局。

这种城乡伦理冲突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具有普遍性。当时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的“文化复兴理论”，本质上都是对这种伦理危机的回应。沈从文通过《边城》的悲剧书写，参与了当时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思想论争——他既不同于鲁迅对传统的激进批判，也不认同全盘西化的现代性方案，而是试图在悲剧中保留传统伦理的价值微光，这种立场与钱穆《国史大纲》中“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文化观形成学术呼应。

三、阐释学视域下的悲剧意义生成

（一）悲剧根源的认知范式转换

对《边城》悲剧根源的理解经历了从感性认知到文化批判的范式转换，这一过程契合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视域融合”的认知规律。最初的解读往往将悲剧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如天保溺亡的偶然性、祖父病逝的突发性等，这种理解停留在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简单悲剧”层面。随着分析深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伦理冲突”的必然性——天保与傩送的“义利之辨”、老船夫的“伦理两难”等，体现出悲剧作为“伦理过失”的本质，这与黑格尔“悲剧是两种合理力量的冲突”的理论相契合。

最终，通过引入费孝通“差序格局”、韦伯“工具理性”等理论，悲剧根源被上升到“文明转型”的文化批判层面。天保与傩送的选择本质是“私人道德”（兄弟情义）与“公共道德”（爱情伦理）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普遍性。正如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理解始终是过去与现在的视域融合”，对《边城》悲剧的认知，正是通过历史视域（湘西传统伦理）与当代视域（现代性理论）的不断融合而深化。这种认知深化不仅适用于《边城》，也为理解《红楼梦》《白鹿原》等作品的悲剧性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二）沈从文与鲁迅的悲剧书写比较

沈从文的悲剧书写与鲁迅形成鲜明对照，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叙事的两种范式。鲁迅式悲剧如《祝福》，是封建礼教对个体的直接压迫，其叙事充满启蒙者的冷峻批判——祥林嫂的死亡被归因于“四大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共同绞杀，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沈从文式悲剧则如《边城》，是传统伦理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缓慢消解，其叙事渗透着对逝去文明的眷恋悲悯——天保、傩送、祖父的悲剧，更多源于伦理体系自身的文化惯性与现代转型的时代要求之间的矛盾，而非具体个人或制度的恶意。

从悲剧美学看，鲁迅擅长用“匕首投枪”式的激烈冲突展现悲剧，如《药》中夏瑜之死的鲜血与华老栓人血馒头的对照；沈从文则偏爱“挽歌”式的诗意含蓄，如傩送歌声的“戛然而止”、祖父在雷雨中的悄然离世。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激进启蒙”与“文化保守”两种现代性路径的文学呈现：鲁迅试图通过批判传统来推动社会变革，沈从文则希望在现代性浪潮中保留传统的文化基因。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悲剧书写都指向对人性的关注——鲁迅揭示“吃人”礼教下的人性扭曲，沈从文展现伦理裂变中的人性坚守，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悲剧精神的双重维度。

结语：

《边城》的悲剧叙事本质是农业文明的文化记忆建构。沈从文通过茶峒世界的兴衰，记录了传统伦理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困境：当“义利之辨”的伦理体系遭遇工具理性，其内在的刚性结构导致了悲剧的必然发生。翠翠的“等待”因此兼具双重象征：既是对爱情的执着，更是对乡土伦理的文化守夜，这种守夜行为本身构成对现代性伦理的抵抗与修正。

本文将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与中国乡土伦理结合，建构了“伦理过失—文化记忆”的阐释框架，突破了传统“社会悲剧”或“命运悲剧”的单一解读；其次，提出“自然本体论”概念，系统分析了山水意象如何作为悲剧叙事主体参与意义建构；最后，通过阐释学分析，展现了文本意义在不同时代视域融合中的动态生成过程。在当代语境中，《边城》的悲剧诗学仍具生命力。当我们在翠翠的等待中看见现代人性的焦虑，在祖父的坚守中发现传统伦理的价值时，这部作品便超越了时空限制，成为观照中国现代伦理转型的文学棱镜。正如沈从文所言：“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水云》），《边城》的悲剧书写，正是通过人性的光芒，为迷失在现代性迷雾中的人类提供了一座伦理灯塔——即便世界充满烟雨，人性的星光永不熄灭。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边城》[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 [2]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3] 汪曾祺. 《沈从文和他的〈边城〉》[J]. 文学评论, 1980 (02).
- [4] 陈平原. 《沈从文的文化立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03).
- [5] 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 [7]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8]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The Tragic Poetics and Cultural Metaphors in the Misty West Hunan: A Literary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verside Town"

Xie Bi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1)

Abstract: Shen Congwen's "The Riverside Town" takes the Xiangxi tea town as its narrative setting, and constructs a narrative of both poetic aesthetics and tragic essence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fates of Cui Cui, Tianbao, and Nuo-song.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methods to analyze the tragedy narrativ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modern predicament of human ethics, and the cultural metaphor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ivilizations, thus revealing the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ethical order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ragic essence of "The Riverside Town" is the d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value system, and its philosophical use of natural imagery and poetic expression of ethical choices provide a unique aesthetic paradigm for modern literary tragedy writing.

Keywords: "The Riverside Town"; Tragic Poetics; Ethical Criticism; Cultural Metaphor